

尼克松以后的美国

多国公司时代

〔美〕罗伯特·希尔著



尼克松以后的美国

——多国公司时代——

〔美〕罗伯特·希尔 著

本馆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Robert Scheer
AMERICA
AFTER
NIXON
The Age of the Multinationals
Mc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1974

内部发行

尼克松以后的美国

——多国公司时代——

〔美〕罗伯特·希尔著

本馆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⁵/. 印张 156千字

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17·165 定价, 0.6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罗伯特·希尔于1936年生于美国布朗克斯。1958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研究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等校教过经济学和政治学。1964—1969年任《壁垒》刊物主编。著有《美国如何卷入越南和古巴：我们这半球的悲剧》（与莫里斯·蔡特林合著）等。1970年秋作者曾来我国访问。书中对我国持赞扬态度。

本书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本书主要内容是揭露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美国政府，左右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国内外政策，通过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和控制，使跨国公司成为美帝妄图称霸世界的重要侵略工具。作者揭露美国一些大垄断企业的利润一半以上来自海外。为了保证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为了能不断攫取最大利润，为了控制以至颠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各方面的支持，特别需要军事机构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推行“援助”计划，维持特务组织等等。一书中指出美国政府头目和大公司的关系十分密切，总统职位不过是大公司经纪人的办公室，政府官吏不过是各大公司的特约秘书而已，有关内政外交的根本决策，完全是由几百家超级跨国公司根据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做出的。比如，尽管总统可以不断更迭，但石油财团在决定

美国的中东政策时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还认为美苏“缓和”是个大骗局，并分析了跨国公司对“缓和”的态度。本书在上述各方面所提供的资料和所作的分析，对我们研究美帝这个超级大国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不可能对社会矛盾作出深刻的分析，更不可能得出革命的结论，对作者在论述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希望读者在参阅时注意批判。

目 次

前言 谁的美国?谁的世界?	1
第一部分 美国:越过了冷战	11
第一章 尼克松的遗产	11
第二章 基辛格的重大利益	21
第三章 洛克菲勒的公司外交	36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限度	55
第二部分 世界经济中的美国大公司	69
第五章 世界公民	69
第六章 发展狂	82
第七章 一场能源危机的形成	100
第八章 关于一个收缩着的世界的神话	126
第三部分 自由的假象和浪费	137
第九章 对外援助:幻想的破灭	137
第十章 在亚洲一天一美元	149
第十一章 南朝鲜:白色大希望	161
第十二章 中国的生态学	176
第四部分 越过尼克松: 浪费经济和控制的危机	192

第十三章 靠不住的缓和.....	192
第十四章 尼克松以后的美国.....	207
注释	220

前言 谁的美国？谁的世界？

《尼克松以后的美国》这一书名，并不只是表示在他离职以后可以松一口气，也不是表示要考查杰拉尔德·福特的人品。它倒是以这样一种想法为根据的：尼克松的困境是美国政治制度日益趋于全面崩溃的症状。在这多国公司的时代里，对重要事情的有效控制权已经转入一种新的跨国公司的手里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升任副总统，只不过代表着早已进行的一种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十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对外关系协会的研究报告，在意识形态上得到表现，并在所谓的基辛格-尼克松主义中得到初步贯彻。基辛格-尼克松主义由于迎合公众的希求和平与缓和的明显愿望，终于剥夺了我们的公民权。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公众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当前政治争论所涉及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几百家超级多国公司正在替我们作出关于我们前途的根本决定，而它们本身则不受控制。

就资源、劳动力、文化标准、商品买卖、甚至激进派的不同政见现在都具有多国性质这一意义来说，也不再有什么真正本国的或美国的生活了。各大公司通过一整套新式的经营方法，已经独一无二地懂得如何在这新世界中生存下去并掌握权

力,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是始终墨守我们那套陈旧的政治仪式。理查德·尼克松的倒台,不仅揭露出各大公司在政治上行贿拉拢的勾当,而且也揭露出一种权力真空,政府制订规章人员、外交官、国内收入署官员,与其说是作为管理公众事务的人员,还不如说是作为各大公司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

把国内政策同对外政策分离开来,是剥夺美国公众权利的头一个行动。就能源公司来说(这只是尽人皆知的事例),各石油公司的经理人员暗地里操纵了有关中东石油资源的对外政策,而把阿以争端这种较易激动人心的问题留给我们。现在美国经济是如此密不可分地和世界经济缠结在一起,又是完全受一些最大的多国公司的支配,以致任何不首先考虑这些大公司的作用而要讨论我们的突出问题(不论是通货膨胀、浪费、失业,还是厌倦文化)的企图,都是骗人的勾当。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情绪不断受到石油公司大量广告的刺激,它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我们”美国人和“我们的”能源问题。他们加我等于“我们”,这是冷战年代美国社会上一种受珍视的神话;但是近来这一神话,连同所谓由公司替我们的福利问题作出决策是有效的和必要的这一类有关神话一起,已经被彻底粉碎了。约翰·K. 贾米森是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拥有该公司差不多三百万美元的股票,他在1973年从该公司得到总额六十二万一千美元的报酬。¹能源危机对他的影响同对我们的影响不一样。实际上他不受影响。那个负责一直很重要的莫比尔石油公司广告(由“我们”出钱)的家伙,凭他企业家的本领获得了五十万美元;²在美国认为他有资格拿这笔钱的人或许只是其他大公司的一些经理和少数专

业经济学家——得者和失者的结合。但是，本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问世的，这时已不再需要大嚷大叫阶级差别的存在和权力的集中了。在下一段时期里，这类意见将成为老生常谈；人们的注意力将回到一些严重的问题上面：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怎样能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和政治舞台上表现出来，以及什么事情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关于“美国利益”的某种狭隘概念。

的确，在本书其余部分送交排字工人之后，一项哈里斯民意测验发表了，它表明人们对于我的一些最能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根据这一民意测验，四个美国人当中有三个人认为，制定税法的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而不是帮助普通人；百分之七十八的人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多于人民所得到的；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几乎是每五个美国人中有四个）现在认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测验的类似结果，这些数字就意味着，关于公司美国是个越来越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一战后的美梦是一去不复返了。或者，引用哈里斯调查报告的话：

对于我国状况不再抱幻想的人在美国人民当中现在已达到这样大的比例，以致感到不满的人从1973年的百分之五十五上升到现在打破记录的百分之五十九，比1966年增加一倍多，1966年感到不满的人是百分之二十九。

这种感觉很普遍，因而人口中每一主要部分都有一个多数对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公正和社会中个人应负的任务感到厌烦。⁸

但是，对于这一制度的不公正感到厌烦，并不等于了解为什么这种制度会是这样，更不等于了解能够采取什么对策。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出现了一种不关心政治和愤世嫉俗的激进主义或人民主义。

这种情绪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对于过去十年政府和公司的操纵手段的揭发，是紧跟着前二十五年不动脑筋的爱国主义以及冷战狂热之后而来的。在这过程中，我们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了解使社会变成目前这个样子的各种力量。通货膨胀、种族主义、安装窃听器、战争或石油涨价，似乎都是一幅各种不公正现象的镶嵌图案的一部分。这些小小的损害彼此之间看来也没有任何联系——它们似乎既是费解的，又是零零散散的。我们的心思极度激动地从这一项事情匆匆转到另一项事情，不久就对整个这一套感到厌烦了。

统计数字所记录下来的厌烦情绪，仅能表示乐观的部分理由。和那冷战时期所特有的错误行为与自命正直的气概令人不耐地相一致的情况不同，这当然是一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但是，如果说这种情绪不能引起人们对于我国的制度有新的认识并提出改革方案，那么，它就只会激起人们对某处的某个“敌人”重新发泄一阵不起作用的怒火罢了。

我们的厌烦情绪部分地来源于这一事实：在冷战年代，我们被宣传所惑，相信了美国是无阶级社会——同舟共济——这一神话。关于我们把这一看法铭记在心的程度如何，很好的说明是，当约翰·D. 洛克菲勒第三已经成为需要来一场“革命”的预言家时，他并没有马上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他在一本叫作“第二次革命”的书里建议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结果就势必在任何其他先进工业国家里变成一个笑柄——一出拙

劣的布雷希特^①式的笑剧。

洛克菲勒革命在精神上是服装、发式和青年的革命——许下诺言要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而不妨碍那些最要紧的现有经济关系。关于权势核心人物或控制中心的想法，被认为是与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无关的过时的想法而立即遭到摒弃。人口过剩变成无害的问题。

好吧，如果谁“拥有”银行，确实无关大局，那么，我就要一家银行，并为此愿意放弃生两个以上孩子的念头。但是，实际上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就该有四个孩子和一家银行，我就该犯罪。当我们本能地知道政府各委员会所代表的各大公司将继续为所欲为时，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政府各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如洛克菲勒打算保护我们的未来那样的努力)感到厌烦，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否认这场把戏是有人在用欺骗手段进行操纵，那就意味着向它投降；但是，如果不能另辟蹊径，制订出一种认真的社会方案，那就等于采取一个孤立的不满现状者的态度。我们产生沃尔特·米蒂式的罗宾汉^②之流的人物和有魔力的基督教徒的能力，似乎比产生热心的激进派或改革家的能力大得多。

这种厌烦政治的态度蔓延到在六十年代为变革提供主要推动力的那些个人和集团身上。虽然一些调查研究现在表明，大学学生现今比在造反的六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反对公司和政府的权力，可是同时各大专院校却已经变得清静

① 贝尔托尔特·布雷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以撰写暴露荒谬的坏人坏事的笑剧著称。——译者

② 十二世纪英国传说中的侠盗，与同伙盘踞舍伍德森林，劫富济贫。——译者

无为了。黑人吃了尼克松经济政策的很大苦头，但是黑人积极分子的活动大部分已经被纳入政府的种种方案的轨道，否则就是主要在监狱中进行。和平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垮台的，这时世界上由美国带头，花在充实军备方面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花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的钱则相应地减少。许多环境保护论者似乎更加关心较低限度的污水和垃圾，而没那么关心解除公司的权力。这大部分是由于这一事实：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开始，我们进入了世界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一批批持不同政见的人在分析、说法和方案上闹得个措手不及。

这本书是关于冷战以后的政治的；是关于美国的生活及其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作用的，在这个世界中，现在的权力结构和问题同过去这些年引起我们注意的权力结构和问题大不一样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有人认为基本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进入丰裕社会的时代了。

但是，我们现在亲眼目睹，三十年代的经济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出现了。未来主义者预言，在一个匮乏之后的社会里，我们的食物需求可以用压缩的苜蓿丸来解决，我们的能源需求可以用丰富的核动力来解决，可是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全世界现在都十分关心增长和匮乏问题，世界经济中贫富之间的极端矛盾现在比马克思所预言的最阴暗的情况还要糟糕。

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在被出卖，这是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人们写这类的书，并不只是因为看了一份哈里斯民意测验，或者在图书馆偶然碰到某些有趣的资料。我的感性认识并不是没有倾向性的，它们并不是在签订本书合同之后

自发地发生的。在过去十五年，我“报道”过世界上许多贫民区——在主要系统之外的第三世界，其中包括奥克兰港的一些市区以及东南亚——的情况。在那个期间，我开始了解到，我在各处看到的现代文明的明显标志——大通银行、埃克森石油公司、马尔博罗公司、摩托罗拉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也就是新的权力象征。非常明显但使我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种占压倒优势的企业活动没有出现在政治新闻报道里。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解释是，我们的典型记者已经开始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是赞扬）国际-公司-消费者文明是现代生活中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你不必报道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就象描写氧气那样——好歹它存在着，我们越来越依靠它了。

如果不是我也去过北越、北朝鲜、古巴和中国，这种消费主义毒素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一些。可是，1970年秋季，在文化革命以后访问中国时，我看到了一个社会，其中没有除臭剂，没有精心设计的最得意的工业，没有西尔斯公司的密封垃圾车，甚至没有私人汽车，可是八亿人不知怎样都生活下来了。不管这是好是坏，我觉得更紧要的问题是，现代公司资本主义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还有其他一些型式是在冷战以后的时代人们终于会有机会公开地加以研讨的。这也是一种对于比较贫穷的国家将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型式，因为这些国家曾经试图仿效美国输出的“自由世界型式”，可是，尽管我们政府口口声声说它有多少好处，这些国家还是发现它们自己比开始时更落在我们的后头了。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中国人所主张的世界上基本矛盾乃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这一说法，一定含有某种使人不得不信的逻辑性。

就是这一说法，现在我们不能不更加认真地对待了，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也是如此；因此，它成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母亲，这不仅是因为一些明显的原因，而且也因为，我从她的经验中所了解到的东西给了我某种洞察力，能够看清为什么三个美国人中间有两个人现在告诉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说，通货膨胀是他们最迫切的问题。我母亲在几家卫生衫工厂里工作了四十六年，并且忠实地缴纳她应缴的税款和工会会费，现在要让她依靠每月二百六十七美元来生活了。这就是，从社会保险金得到一百九十二美元，从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得到七十五美元，后者是被大力宣传的一家进步的工会。千百万退休工人赖以谋生的收入比这还差得多；也有比这稍稍好一些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虽然我开始写书或亨利·基辛格当起国务卿来，这些事情本身并不是经济民主的胜利，也不是一般社会机动性的明证。

在布朗克斯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中学时，人们教导我说，我们美国已不再有阶级了。但是，我承认有偏见，从那以后我所看到或读到的东西都没有驳倒我在学校时的想法，即大多数人被压榨，少数人压榨人。

本书以下各章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保持中立的，也不能希望是平心静气的。我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仔细地注意证据；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制度根据它的活动来看，并不是伟大的。几天前，在奥克兰一家爱尔兰共和派的酒吧里，

有人凑到我跟前，酒气直喷地悄悄说，“干掉阔人——把这话传下去。”我还没有喝醉，首先并且正确地觉得这是一个颇不成熟和无计划的建议。但是，这到底比揍斯坦福或杀东方人的建议中肯得多；如果它变得流行起来，那至少还会有些可以谈论的东西。（我留下一张便条说，看我的文章的编辑会删除上面所说的这句话的，因为一般倾向是会从一本必然带有高傲语调的“非小说”作品中删掉一些这样轻率的东西的。但我并没有用傲视一切的态度来写这本书。）因此，让我彻底说清一件事。我从来不喜欢尼克松，因为他力图做出我们不能做的坏事而不被人发觉，并且还自以为是理直气壮。可是象洛克菲勒和肯尼迪这类的人并不需要要这种卑劣的手段。我倒能够同情尼克松搞的一些非法经营，因为他还觉得有必要为他的家庭积攒一点东西——给他的弟兄一个工作，给帕特一些珠宝，以及以后他们能引以自豪的一所漂亮住房。他“对他的未来感到发愁”，这一事实对我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是他在社会方面无能的一种可怜表现，更不必说冒失的想法了；他本来应该知道，人们决不会让他做了坏事而不受惩罚。他动得太快，太低劣，而不是等待时机，等候那以后会到来的比较体面的好事情——拿一百万美元的传记稿费，在头等大学当校长，或者管理福特基金会。理查德·尼克松的修养已经表明不足以担当在管理这个国家的同时积攒一点钱的大任；他已经认为一个下层中产阶级的孩子想爬上国家的高位要困难得多。但是，尽管我很兴奋地看到这个具有穷苦文人特征的人被撵下台去，我却决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他的罪行是仅有的重要罪行，或认为他的去职可以保证我们获

得自由。只要仔细看看他，你就知道这个人并不是老板。

以下各章并没有揭露一种阴谋理论，也没有揭露在它后面的“老板”。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东西，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权力往往是用一些微妙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办法来行使的。尼克松的政治冒险，虽然颇不吉利，却只是那已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东西的一小部分。他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着的环境里进行活动的，我们不应该把他个人的弄巧成拙看作他拒绝认真地赞助公司美国的种种目标的表现。本书的主旨正是要研讨这些更基本的利害关系和权力问题。